



第3版

第三版责编、版式 袁琰璐
2016年1月9日
Email: wenhuijiangtang@163.com

文匯講堂



冯契专场听众观点回访——

中国哲学家需要立足传统、放眼世界

编者按：

10月31日，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大师》节目组总导演、《冯契》纪录片总撰稿王韧、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郁振华、教授赵修义、杨国荣、陈卫平、高瑞泉、晋荣东、顾红亮做客第96期文汇讲堂，主讲《谁是冯契？一位与世界对话的哲学家》，讲座结束后，文汇讲堂对部分听众进行了回访。

回访时间：

11月6日，电话回访6人，邮件回访1人。

回访对象：

孙立荣 65后 证券交易所人员
王一芳 75后 编辑
张君平 80后 教师
刘晨辰 85后 高校教师
郭舟洋 90后 公务员
于敏 90后 哲学系研究生
李方哲 00后 学生

哲学家：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问题1：冯契这样原创性的哲学家产生有其特殊背景，既有学术传承，又有革命经历和生活实践，您觉得哲学家在今天可以培养吗？

孙、刘、郭：很难，哲学本身来源于生活。而当下大环境下现实的生存压力大，目的性、针对性强，诱惑多，哲学家不是一个马上能培养而出的身份。

王、李：当下相对如冯契所处的乱世比较困难，许多大师都出于民国，即孟子所言“生于忧患”。而现在物质条件优越，容易消磨人的意志和体质，现实冲击小，思想很难突破，甚至学术功利等现象都会出现。



①第一轮，王韧与赵修义、高瑞泉、晋荣东(从左至右)共话冯契其人
②第二轮，郁振华、陈卫平、杨国荣、顾红亮(从左至右)共话冯契其学
③讲堂听众提前观看纪录片《大师·冯契》

张：哲学家要有所成就、有所贡献、有历史地位(如哲学史)，都一定是严谨治学、耐住苦寒且读好了“社会这本大书”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冯友兰先生是极有名的，金岳霖更是“如雷贯耳”，哲学门外汉的读书人大概都不会说不知道的。我更以为生活中充满着哲学，是一种对世界的基本认识，既虚又实。

于：人的成长具有特殊性，不可能人人都成为“冯契”。哲学家的要素有理想化平民人格和浓厚氛围引导如社会大环境、自己独立主动思考。

知“冯契”其人，解“冯契”其学

问题2：通过嘉宾对话访谈，您对冯契的主要哲

学成就是否有所了解，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会去看吗，如《智慧说三篇》？

孙、郭、李：讲座前不是很了解，阅读讲堂小报进行讲座内容外的拓展，业余时间较少。

王、张：总体上通过嘉宾对话访谈，尤其是看了“大师”专题片的两个片断，冯契先生的形象、哲学成就、专业人士的评说都留下了印象。冯先生的“智慧说三篇”是一定会去看的。

刘：通过华师大网站信息、讲堂小报和纪录片对冯契事先做了一个了解，讲座后对其治学和为人态度有了更深的了解，淡泊名利、胸怀天下，拥有当时那个年代学者的风貌。

于：有看过冯契论文，但书较难买到，上课如中国近现代哲学史提到，但无专门关于冯契的课

程。讲座后更了解冯契生平，对理解学术思想有利，如之前只知道师从金岳霖，后知冯友兰、汤用彤同样是其老师，之后可通过了解此二人更进一步理解冯契思想。

当下中国哲学与世界的对话方向产生变化

问题3：您怎么看待冯契作为哲学家的与世界对话？中国哲学家和中国人可以在今天如何参与或介入？

孙、郭：冯契先生本人是中国哲学的一个代表，人文精神浓厚。这种对话是中西合璧，各取所长的契机。

王、刘：中国哲学建立在一元体系化的背景下，相较西方国家多元化，互相的对话会存在一定矛盾，但人文学科这种冲突是难免的，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

于：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清末民初开始，其实中国哲学一直都在和世界对话，并不存在一个专门的时间节点，如李大钊、梁漱溟等都在立足中国传统的基础上，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应西方哲学的冲击，包括冯契先生本人思考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当下随着国家的富强繁荣，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哲学主动关注的投入也相应增加。

李：虽冯契先生未出国学习，但是讲座中提及他阅读过很多西方哲学著作，例如了解欧洲就要阅读茨威格。“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这也体现了冯先生的学术自信。当下创造了更多中西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中国本土哲学也更吸引西方，中国哲学与世界的对话方向也在产生变化。

(回访设计：李念 实施、整理：丁怡 撰稿：丁怡)

(上接第2版)(A Demographic Portrait of Asian Americans)、《婚姻与同居》(Marriage and Cohabitation)、《美国科学正在衰落吗?》(Is American Science in Decline?)等著作。这位国际社会科学界公认的领军人物谈到自己的心得时说：“所有研究都是借助于这种方式(即在邓肯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三个基本原理，承认总体异质性的同时抓住组间层面的规律)。”

“邓肯他所想、所做的也是我所想、所做的”，在《奥蒂斯·邓肯的学术成就：社会科学中用于定量推理的人口学方法》的文末，谢宇写道：“对于我和其他人来说，邓肯是划时代的最杰出的量化社会学家……他在社会学方法论方面的工作，影响了整个一代量化社会学家。”

“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我见过的人中是邓肯，没见过的人中是柏拉图。”这简单的一句话背后，是西方学界从柏拉图到邓肯两千多年方法论的演进；而谢宇从一位社会科学领域的欣赏者变成了共同的推进者。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知可为与不可为

采访当天恰好是圣诞节，下午的讲座结束后，谢宇的行程安排是陪家人一起吃一顿晚饭。“我昨天还游泳了”，他用“体力好，心情好”形容自己相对同龄人的幸运和特别。从出生于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而顺利长大，到高中毕业赶上恢复高考，再到在美国留学、做学术、做教授，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谢宇一直为自己的“好运气”感恩。

北大CFPS数据库，打算做一辈子

2006年起，谢宇开始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推

动中国实证研究的发展上。在他阔别多年之后，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可能在其他社会情境中重现”的社会变迁，人口、经济、社会分层、家庭和价值观念都在迅速地发生变化。“中国可做的题目太多了，可很多事又没人做”，谢宇举例如中国的同居情况已达到30%，可这个领域却从未有专业性研究。他试图在社会分层、社会人口领域，以跨学科的方法贯穿研究，在考虑异质性的同时把握普遍性规律，解决理论性问题，实现该领域内中国研究与国际研究的接轨。

同一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Survey, ISSS)开始筹备“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y, CFPS)”项目。从2010年到2014年，CFPS已完成三轮全国调查。这是谢宇十分骄傲的一件事，身为主要负责人，他在2013年写道：“至今，动用了22万份问卷，花了4百万分钟访问时间。这样的调查，现在想想也可怕，但竟也做了。”向下一代和全世界提供中国最好的历史数据，成为了这位社会科学家朴实而伟大的梦想，“我打算做一辈子”。

研究生就是合作者，从影响下一代开始

谢宇在国内高校(如北大、人大、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也在积极地培养着自己的学生。他的一位得意门生Alexandra Killewald在哈佛教书，如今已是社会学界的一颗新星。2015年4月她在推特上写：“Conferences are great time to remember wise words of my adviser Yu Xie. don't worry too much, you're not that important.”

对于学生，谢宇把他们看作“合作者”，他认为研究生不是读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李汪洋是他在北

京大学带的第二个博士生，在谢宇给李汪洋的邮件中，第一句话总是“Good job”，这句话每次都能给李汪洋很大的鼓舞。“和谢老师一起，学到了很多，他总是在鼓励中给你提出十分具体的建议。”每逢重大的采访和讲座，谢宇也总是请几个学生和助手一起看过后，自己再定稿。

更大意义上的“学生”是下一代。2015年9月，谢宇再次和饶毅、鲁白合创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他要求自己至少每月写一篇稿件，还要多参与线下活动。谢宇希望，借助中国自然科学界相对良好的风气和学术力量来影响年轻一代，让他们有机会彰显个体的声音。

三种思维习惯的自我训练

谢宇说自己此生要做三件事情，一是北大CFPS数据库的积累；二是培养海内外学生；三是用量化方法做中国课题，并使之与国际接轨。虽然他已做了外人眼中看来的大量工作，但谢宇也时常自省“每个人能做的事其实很少”，比如社会科学无法成为严谨的科学，一个学者不仅要知晓其学术结果具有局限性，同时也应该知道自身的局限性。“我一生羡慕愚人……我以前的确什么也不知道。现在我进步了，我已经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在可为与不可为中，谢宇定义自己的“度假”就是“工作”。乘车时、聊天时、看书时，似乎所有场合随时都可以满足他工作的条件，他称这种“特异功能”为思维的习惯性：听别人的讲座时进入状态变成作者思维；课题交谈时灵光一现、毫无约束的创造性思维；作文章所需要的系统性和逻辑性思维。谢宇也常常在授课时，将零散而独具一格的想法分享给学生，并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与时间将其系统化。“三种思

维交替，不会累”，工作于谢宇，不是负担，而是享受。

养成对自己负责的习惯

谢宇认为，自主性的思考习惯也来源于他从小时的独立。由于父母工作繁忙，“所有重大决定都要自己做，自己对自己负责”的意识儿时便已养成。对比当年穷困又缺乏资源的年代，谢宇觉得，身处当代既是年轻人的幸运，也是他们的不幸：“今天的年轻人和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他们有更多的选择，而我们当时却没有。因为有选择，他们更幸运。因为有选择，他们也更茫然。”对待正在上大学的儿子和女儿，谢宇把自己描述为一名支持者：“我尊重他们的个人选择，相信他们有能力，我给予充分的自由，但自己要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2015年8月，谢宇离开了工作26年的密歇根大学，转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和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担任教授和主任。在私立大学优越的资源条件下，他希望能教授更多的国际学生，培养下一代学者。在微博中，他自语：“真正的tenure(终身教职)是实在的、永久的、无约束的……我真的要走了”。9月，他在《知识分子》创刊词中写道：“知识分子应该以追求知识、追求独立思考、追求创造性思想为职业。”回望自1989年在密大担任助理教授开始，这个理念从未改变。

从美国到中国，从密大到普大，从赛先生到知识分子——正如谢宇的一条微博：一杯咖啡，一只装满数字与信息的智能手机，一句“On my way again”，社会就在脚下。

(指导/文汇报记者李念)